

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专栏

《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之谜与 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困境

任龙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城堡》在卡夫卡研究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小说中仍有一些基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主人公K是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就是这类问题中的一个。关于这一问题,卡夫卡研究者们莫衷一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持有相应的证据。实际上,K的身份具有模糊性,断定他是或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均是片面的。在K模糊的身份背后,恰恰隐藏着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关键词:《城堡》;土地测量员;模糊性;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52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5-0063-11

0 引言

早在1980年,弗兰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就已经被译介到中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汤永宽(曾艳兵,2009:441)。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我国有关《城堡》的翻译、研究历史已达40年,且《城堡》被公认为卡夫卡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是《城堡》中的一些问题目前为止仍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其中不乏某些基本性的、能够左右作品理解方向的重要问题。主人公K究竟是不是一位土地测量员即是一例。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卡夫卡研究者们分歧重重,认识较为混乱。继续追索下去,会发现许多国外研究成果同样也是各执一词。

1 关于土地测量员的种种分歧

《城堡》的主人公K是土地测量员吗?一部分学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叶廷芳(2009:

收稿日期:2023-11-06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卡夫卡研究早期文献整理与分析”(HB21W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龙,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卡夫卡研究。

引用格式:任龙.《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之谜与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困境[J].外国语文,2024(5):63-73.

21)指出“(《城堡》)小说主人公K是个土地测量员,一天他要去城堡——衙门所在地述职”,认为K是受聘于城堡的,肯定了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不过,并不是所有持肯定态度的学者都是通过判断句的形式明确地阐明K的身份的,有些学者更倾向于将“土地测量员”用作“K”的同位语。阎嘉写道:“长篇小说《城堡》中个人与社会(制度)的冲突也与现存法律问题有关,主人公土地测量员K行动的口号是‘以法制反统治’。”(阎嘉,1996:14)谢春平等研究者也认为:“长篇小说《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夜晚踏雪来到神秘、强大的城堡面前,对自己的命运已了然于胸。”(谢春平等,2002:106)此类“土地测量员K”的同位指称方式暗含着一种等同意味,默认了“K”与“土地测量员”是可以同义互换的,同样也认定了K就是一名土地测量员。

与肯定的答案相对,也有一部分学者否认了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认为城堡根本没有聘用K,K从始至终都在说谎,所谓的土地测量员的职位只不过是一个托词。胡志明指出:“‘土地测量员’的称呼只是他(即K)为了在城堡下属的村庄客栈里留宿过夜时,由于一个好事者的逼问,他误打误撞地临时捡得的一个头衔。”(胡志明,2007:207)张玉娟也如此评价K:“他撒谎,说自己是个土地测量员,他自以为真诚地爱上了弗丽达,都是他接近城堡的表现。”(张玉娟,2009:215)在这些学者看来,K根本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而仅仅是一个漂泊者,一个误入城堡所辖村庄的流浪汉。

另外,还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一些学者有时会将上述肯定的与否定的两种倾向混用在一起,使得其著述中出现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形。《卡夫卡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一书中,一方面讲“《城堡》的主人公K踏着白雪皑皑的小路,摸黑来到城堡附近一个小村子投宿客店,声称自己是城堡统治者维斯特-维斯伯爵聘任的土地测量员”(吴金涛,2007:240),由“声称”透露了对K的身份的怀疑。加上之前的“自称土地测量员的K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吴金涛,2007:51)一句,K似乎已经被认定为说谎者了。但另一方面,书中又指出《城堡》“写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吴金涛,2007:109),从这样的语气来看,K似乎又被默认成了土地测量员。同样地,《独一无二的卡夫卡》一书指出,“小说主人翁K最初努力扮演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角色,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郑际根,2007:41),一方面,“扮演”的说法似乎倾向于认为K未必是一名土地测量员,不过另一方面又强调“应聘”,且书中另外一处还写道“K被城堡聘为土地测量员,现在来就职”(郑际根,2007:10),似乎又倾向于认为K是一名已受聘的土地测量员。究其原因,此类混用做法想必并非研究者们有意为之,而是恰恰表明了K是否为土地测量员这一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涉及此类问题时,一旦不经意地一笔带过,往往就容易产生一些疏漏。

类似地,上述分歧在教材之间也广泛存在。如《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中提及《城堡》时,

采用同位语的形式肯定了 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卡夫卡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城堡》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土地测量员 K 来到城堡管辖下的村子的旅店投宿。”（郑克鲁，2007：660）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外国文学史》中则明确地认定 K 说了谎：“（《城堡》）主人公 K 来到城堡管辖下的一个村子。他假称是受聘于城堡的土地测量员。”（聂珍钊，2015：147）一般而言，能够被写入教材的内容往往是被普遍认可的常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定论，相应地其影响范围也很广。但在 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这个问题上，“常识”之间仍存在着相互矛盾的情形，呈现更多的是“争论”之态势而远非形成“定论”。由此看来，K 究竟是不是一位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论题，如能厘清此问题，想必对卡夫卡的研究者、读者以及对日后的外国文学学习者而言都将会有所助益。

2 身份模糊的 K

想要破解 K 是不是一位土地测量员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回归《城堡》的文本内部，探寻小说本身到底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线索。

认为 K 确实是土地测量员的观点在小说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K 曾对施瓦尔策说道：“我是伯爵招聘来的土地测量员，明天我的几个助手就要带着各种器件乘车随后跟来。”（卡夫卡，2015：4）这是 K 自己对其身份的一份明确说明，也是相信 K 是土地测量员者的一条重要依据。随后，城堡办公厅主任亲自打来电话，支持了 K 的自述。另一条重要的证据则是来自克拉姆的信，信中明确告知 K“您已被聘任为大人供职。您的直接上司是村长”（22），这可以说是给 K 的一份聘任书。

然而，上述证据中也存在着不少可疑之处，这些可疑之处也被不相信 K 是土地测量员者发掘出来，构成否定 K 的身份的依据。助手问题即是一例，按照 K 的自述，他的助手本应与他一样从村外赶来。但是，后来的两位助手 K 并不认识，而且他们是从城堡方向来的。于是，K 的自述便显得并不完全可信了，循着这样的思路，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疑点。

关于城堡打来的确认电话问题，村长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他提到从村里给城堡打电话时，“那边最下一级的办事部门的电话就都一齐响起来”（65），只有那些想放松消遣一下的官员才会去接电话。由此，所谓的确认电话根本没有什么效力。克拉姆的聘用信也同样值得怀疑，按照村长的说法，此地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城堡聘请土地测量员一事仅仅是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力造成的一桩误会。

认为 K 根本就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的最重要依据来自《城堡》第十四章中的一段心理描写。K 觉得如果那天施瓦尔策没有来逼问他的身份的话，那么将会出现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K 在第二天办公时间内去求见村长，老老实实地按规矩报上自己的外来漫游工匠身份，声明自己已在某一村民家有了住处，很可能明天就继续上路；这样

一来也许又会出现另一种哪怕是可能性极小的情况,即他在此地找到了活干而留下来。”(149)此段描写明确提及了K的外来漫游工匠身份,大多否认K是土地测量员的研究者均依据这一点做出了最终判定,尤其是在将这段文字从其具体的上下文当中抽离出来之后,K是说谎者的判定就显得更加有力了。

一些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为否定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提供了支持。瓦尔特·索克尔在论文《弗兰茨·卡夫卡》中指出:“K对城堡的要求并不合理,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任命为土地测量员。”(叶廷芳,1988:673)在他看来,那些认为K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的众多评论家,均受到了“K的弥天大谎”(叶廷芳,1988:673)的愚弄。索克尔为表现主义文学研究的名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收录在论文集《论卡夫卡》中,鉴于该书在国内卡夫卡研究界的奠基性地位,索克尔观点的影响力就变得更加显著了。类似地,学者欧文·斯坦伯格也曾条分缕析地查考出K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的多重理由(Steinberg,1965:185-189)。即便如此,认定K根本不是一位土地测量员也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虽然助手问题可以充当我们质疑K的自述之真实性的突破口,但这一问题并不能对K的身份产生直接影响。的确,两位助手是城堡派来的,不过早在他们第一次到K处报到时,K就已经怀疑他们的来历了。其实问题不在于助手来自何处,因为这两位从城堡来的助手只能证明K的原计划出现了变化,并不能证明K编造了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进一步讲,城堡主动为K派出助手反而还有可能是对K的身份的一种承认。此外,村长的话也并不一定可信。大桥酒店的老板娘就认为村长无足轻重,明确地告知K“在您的问题上村长不管发什么指示都无效”(78)。更加深入地看,老板娘的话也不完全都是准确无误的。比如,当她为K介绍克拉姆的秘书莫姆斯时,起初便弄错了他的职权范围。如此一来,无论是城堡打来的电话、克拉姆所写的信,还是村长的解答、老板娘的反驳,都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各执一词,我们找不到一条绝对公正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话孰真孰假,也就更不能以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的说法为根据,去判定K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先前的诸多论据大多是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形象就K的身份问题发表的主观看法,没有办法分清谁对谁错,那么上文提及的那段第十四章中的关键性心理描写则有些不同。因为其他人物可能会由于不清楚K的情况而做出错误的判断,K自己却不可能不了解自己。那么,是不是由于这段心理描写中提到了漫游工匠身份,K之前就一定是在说谎呢?答案恐怕依然是否定的。实际上,该段关键性的心理描写也存在着再探究的可能。相比于这段话本身,它的上下文内容实际上也同等重要。该段心理描写的前文提到,只要K到来的第一夜能够安稳度过,以后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平顺,不必“半夜三更因为他的缘故去惊动城堡的中央办公厅或是接电话的另外什么官员,要求立刻作出决定”(148-149)。这段文字的确可以解释成K本来只想在村子里当一名漫游工匠,不过此种说法却不是唯一的解释。

K 希望被当成漫游工匠得到收留,还可能是因为 K 觉得直接与城堡打交道会遇到困难,他想通过一种迂回的方法,先在村子中积攒下良好的印象,再循序渐进地,而不是唐突地、催逼式地求取城堡的信任。

了解了 K 也许会采用迂回手段去接近城堡之后,再来看之前引述的那段关键性的心理描写,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首先,该段的德语原文中,“wie es sich gehörte”(Kafka, 1983: 159)表示“理应、相宜、得体”之义,对应中译的“按规矩”(149)。不过,中译在“按规矩”前加入“老老实实地”(149)一词,与原文的意义便有了一定差距。“老老实实地”使人觉得上报漫游工匠的行为是诚实的,反过来说,K 没有上报自己的漫游工匠身份就是说了谎。但原文的“理应、相宜、得体”更强调遵守程序、讲究章法,不能直接推断出是否说了谎,而恰恰可以理解为 K 希望利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小心谨慎地避免人们对他产生反感,一点一点地慢慢向城堡靠近。其次,整个文段也可以被解释成迂回策略的体现。按照 K 的计划,他应避免在深夜打电话打扰城堡官员,而是在办公时间去村长那里上报身份。接着,他打算说明自己已经找到住处,不再需要村长多费心。而且他很快便会继续上路,不准备给村子带来过多的麻烦。到了此处话锋一转:只有在此处能找到工作,他才会考虑留下来。可以看出,K 心中的计划包含着一重又一重退让,但实际上却以退为进,想要通过这种得体的、迂回的方式与村长展开商讨,使得自己留下来的意愿更容易被村长乃至城堡批准。由此,能够找到工作留下来可能恰恰是 K 的内心深处特别希望能够发生的事情,而上报漫游工匠的身份,则可能只是 K 的迂回策略的一个步骤。该段关键性心理描写的下文也一样值得关注:K 第一天向施瓦尔策表明身份被视为一种“没有耍什么计谋”“省去编谎话”(149)的行为。如若 K 一定不是土地测量员的话,上述说法就变得有些令人费解。这时,K 的迂回策略又可以为我们的解释开启一种解释的可能。迂回式地慢慢接近城堡难免要搞很多遮遮掩掩的动作,相对地,在施瓦尔策的逼问下,起初就亮明自己身份的做法反而显得更加直截了当。这样看来,K 说明自己的土地测量员身份非但不是说谎,反而是开诚布公的举动。当然,必须要加以强调的是,此类迂回策略的说法仅仅是多种解读方法当中的一种,小说文本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有限,并不能确凿地认定迂回策略就是这段文字唯一正确的解释,但是也正是对小说文本本身的细致挖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的可能,让我们不再局限于 K 一定是在说谎。

类似地,瓦尔特·索克尔等学者也是仅仅抽离出了上述关键心理描写的部分段落,并未联系其上下文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因而其结论尚有进一步商讨的空间。有意思的是,索克尔还曾指出“卡夫卡的寓言所展现出的恰恰是任何事物都不可以被展现。它们传达的不是伦理的信条或道德的命令,而是碎片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Sokel, 1959: 232),并认为正是这一点使得卡夫卡“区别于同时代的表现主义戏剧家和表现主义团体”(Sokel,

1959: 232)。如此看来,索克尔自己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卡夫卡笔下的不确定性,但在 K 是否真的是一位土地测量员这个问题上,却偏偏落入了确定性的窠臼,着实令人遗憾。在这方面,马克思·勃罗德的观点同样颇有意味。在 1926 年的《〈城堡〉第一版后记》中,勃罗德称 K 为“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335),这里所用到的“angeblich”(Kafka, 1983: 347)一词,有“所谓的、自称的、名义上的”之义,似乎说明勃罗德倾向于 K 说了谎。实际上,上文提及的欧文·斯坦伯格认定 K 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的观点也是受到了《〈城堡〉第一版后记》的启发。然而,在后来的《卡夫卡传》中,勃罗德写道:“K 声明,他是接受邀请来的,他本该在此获得一个正确的职位,一个土地丈量员的职位。这一邀请是否真实,或是否是 K 自己臆造的,这个问题是整个长篇小说围着转的中心。”(勃罗德, 1997: 190)此段中,两个“是否(ob)”之间用“或(oder)”(Brod, 1966: 165)连接,构成的是一种平等的选择关系,并无明确的倾向性可言。较之从前,其态度显得相当中立。且勃罗德还强调“K 为何不能与当地入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勃罗德, 1997: 189),他并没有将 K 未能融入村庄的原因归结为 K 是一个冒充者,而是把它视为一个谜题,一个难以揭晓其谜底的谜题。

综上,K 究竟是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这一问题是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的,K 的身份本身就具有模糊性。以往那些认定 K 就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的观点是片面的,而那些坚决否定 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认为 K 只是一个说谎者和流浪汉的说法也同样是片面的。在这个问题上,否定的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比肯定的观点更进一步,因为它挖掘出了诸多证据,试图否定 K 的自述,但这种否定的观点并没有看到的是,对于用以否定的证据本身,还可以进行再否定,从而使得 K 的身份走向模糊。正如我们难以确认《城堡》中巴纳巴斯究竟是不是信使、弗丽达究竟是不是克拉姆的情妇一样,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也是不确定的,他既可能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又可能是一个流浪汉,但就是无法确切地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

3 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深入探究了《城堡》的文本内部之后,我们得知 K 的身份本来就具有模糊性。那么,也许这样一个问题仍需要被继续追问:为什么 K 的身份会具有模糊性?当问及这一问题时,单纯地向文本内部挖掘已经没有办法给予解答了,因为这是一个与人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的问题,必须要扩展到文本外部才可能找到答案。由此即有必要引入外部研究的方法,返回到卡夫卡的生活世界中去,探析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民族身份认同对《城堡》中主人公的身份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学者雅克·鲁普尼克指出:“作为一个生活在捷克人的首都的说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成为处于‘中间’位置的犹太人群体的一个缩影,被夹在传统的对德意志文化(和语言)的忠诚与新的中欧斯拉夫民族的自信之间。”(Rupnik, 1990: 252)布拉格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必须扩展到其所在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捷克政权的整体背景下加以探究。而对于卡夫卡所在的布拉格来说,需要把握的是在德意志人统治下的捷克等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意识问题。

在波希米亚,甚至在整个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范围内,捷克人的民族意识是萌生得较早的,其原因需追溯到经济层面。18世纪早期,波西米亚的经济形态仍以农耕为主。1740年,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娅·特蕾莎继承王位,但由于继承权问题,爆发了奥地利继承权战争。“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丢失了大部分他们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西里西亚及其在纺织和冶金方面的资源。”(马奥尼,2013:96)为了弥补西里西亚工业产品的损失,玛丽娅·特蕾莎鼓励波希米亚实行工业化。由此,捷克人的经济力量逐渐上升,在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之中,民族意识逐渐得以成形。而在政治层面,受席卷欧陆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哈布斯堡王室转向开明专制主义,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均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此为契机,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传播开来,也对捷克民族意识的产生提供助力。捷克民族主义运动最初致力于历史和语言文化的发掘。通过对历史材料、民族神话和民族英雄的关注,捷克民族的合法性越发得以被确证。在发掘民族历史的过程中,捷克语的重要性与独特魅力逐渐被置于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尤其是1817年至1818年两大手稿的发现使得捷克人对本民族语言的自信力大大增强,《王宫手稿》据称写于13世纪;而《绿山手稿》则被认为大约写于10世纪,早于中世纪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Spector,2000:41)。于是,人们相信“捷克语言和文化与那些日耳曼人及其他主要欧洲民族的一样古老和有价值”(马奥尼,2013:108)。虽然在1886年这两部手稿被证明是伪造品,但它们在增进捷克民族意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

在历史与语言文化方面树立了信心之后,捷克民族主义运动开始转向政治权利的争取。1848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民族主义运动追求平等权利的重要舞台。此番革命中,由布劳纳博士校订的捷克民族主义者请愿书即充分体现了上述诉求,成为“令激进的意图屈从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波希米亚王冠的历史和民族问题之关注的第一步”(Demetz,1997:288)。1848年国民权利法案第19条明确规定:“所有人的居住权和培养自身民族性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贾德森,2017:184)不过,捷克人长期以来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仍停留在忠于帝制阶段,仅限于要求在帝国框架内部获得更多的权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捷克人慢慢开始有了摆脱帝国统治,实现完全独立的诉求。马萨里克等人起初依然还是希望能够在—个联邦制的帝国中为捷克民族谋求发展,直到20世纪初才渐渐转向推翻帝国统治,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匈牙利的影晌是非常关键的。玛丽娅·特蕾莎当政早期,匈牙利曾在军事方面给予过她支持。作为回报,帝国对匈牙利地区的管制是相对宽松的,使其得以规避集权化的制约,正是这样的特殊地位令匈牙利成为较早产生独立意

识的地区。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匈牙利王国被单独分化出来,“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部分,马扎尔人试图追随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学习他们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以及单一种族的民族国家范型”(Lieven, 1999: 186),其独立诉求由此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运动让捷克人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即追求民族独立的可能,为捷克民族自身独立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影响捷克独立意识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方面,“战争的境遇有助于割断许多捷克人与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的情感联系”(马奥尼, 2013: 134);另一方面,战后欧洲领土的重新划分又为捷克人的独立准备了现实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捷克斯洛伐克于1918年正式成立。所以说,对于布拉格而言,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恰恰是一个捷克民族力量逐渐上升、最终推翻德意志统治的时期。而布拉格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正是在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夹缝之中生成的。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室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总体上讲是很温和的。1781年,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法令,给予犹太人宗教自由,保障了犹太人的基本权益。犹太人“对由玛丽娅·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政府所构成的德意志文化传统保持着忠诚”(Kann, 1948: 250),深深地依附于德意志政权,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

19世纪中后期以来,情况渐渐发生了改变。犹太人成功地在商业贸易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却也因此激起了下层民众和逐渐被资产阶级所取代的贵族地主的仇视。人们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捆绑到了一起,犹太人“被认为是残忍的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Kann, 1948: 242)。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被推到了犹太人身上,人们认为犹太人应为经济紊乱负责。宗教上的分歧也被放大,犹太人杀害基督徒以取用人血的传言流布甚广(卫克安, 2017: 198)。反犹主义倾向风起云涌。在反犹主义浪潮下,捷克民族主义为布拉格犹太人民族意识的萌生提供了双重动力。一方面,作为哈布斯堡境内主要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一,捷克民族主义运动促使德意志统治力量日渐衰微,备受排挤的犹太人逐渐不再能够依附于德意志人;另一方面,捷克民族主义运动又为情势危急的犹太人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让犹太人发现通过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可以争得权利。19世纪80至90年代,在摩西·海斯、犹大·勒布·平斯克和西奥多·赫茨尔等人的努力下,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得以生长。

《城堡》写于1922年,那是一个德意志统治刚刚被新生的捷克力量取代、犹太人的民族独立意识刚刚发展起来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同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倡导的脱离寄居地、建立独立犹太国家的主张,那些定居于布拉格境内的犹太人更多地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这些犹太人希望自身的民族地位得到新生统治者的承认,以确保他们在定居地能够切实地享有权益;另一方面,民族意识的生成使得这些犹太人具备了自主意识,他们已经不愿再以牺牲民族意识的依附手段来求取统治者的承认。由此,统治者的认

可与自身民族意识的保持成为布拉格犹太定居者身份认同问题的两大要素。

《城堡》的主人公 K 的身份问题恰恰表现出了犹太定居者的这种身份认同困境。作为一个外乡人, K 执着地希望能在城堡的领地定居下来。如前所述, K 究竟是不是一名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问题。然而我们可以去追问: K 最终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无疑, K 想要进入城堡, 但其最终目的并不这么简单, 其中牵涉到《城堡》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由”。回到克拉姆给 K 的那封信, K 正是在分析这封信的矛盾的过程中表明了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一方面, 这封信的信头尊称 K 为“非常尊敬的先生”, 还提到要通过巴纳巴斯了解 K 的愿望, 信中的这些内容“像在同一个享有充分自由的人谈话”(22)。但另一方面, 信中也强调克拉姆本人只是在“百忙中兼顾”(22) K 一下, 仅仅把 K 视作一个小小的下属。这样一来, K 面前便出现了两条路: 一是做一名与城堡几乎没有关联的农村工作人员, 二是做一名与村民少有联系的城堡工作者。K 的选择是前者, 因为只有做一名农村工作人员才有可能保持住自己的自由。完全归附于城堡的那些官员们是没有自由的, 诸如莫姆斯和克拉姆都只不过是“一个工具”(103)、一个隶属于城堡的部件。所以, 一旦 K 完全归附于城堡, 则会以下属之名被城堡吸纳, 根本无法维持自身的自由。在这个层面上, 村民们与城堡官员类同, 他们都无条件地成为城堡的附庸, 而保持自由的渴望恰恰是 K 的特殊性所在。既然自由对 K 而言如此重要, 那么是不是 K 只需保持住自身的自由即可, 没有必要在意其他呢? 其实也不尽然。K 未经允许就擅自到室外去等克拉姆, 到头来却白忙一场, 虽然 K 认为“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自由”(95), 但与此同时, K 也觉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95)。等待的自由并没有给 K 带来满足感, 反而使其越发绝望, 那是因为克拉姆的同意、城堡的认证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绝不是可有可无。对于一个设法成为本地人的 K 来说, 完全抛弃城堡认证的绝对自由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只要 K 仍享有这份绝对自由, 那么 K 也就始终还是一个外乡人。

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 K 最终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K 想要的是既获得城堡的认可, 又不失去自身的自由。作为一个希望在居住地获得归属感的外乡人, K 的处境恰恰与当时的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处境联结到了一起。K 希求城堡的认可对应的是犹太定居者希望获得统治者认可的心理, 而 K 对自由的看重对应的则是犹太定居者自身的民族意识。由此, K 的理想实际上表达了当时的布拉格犹太定居者既想获取统治者的官方认证, 又想保持住自身的民族身份的愿望。

4 结语

正是在上述层面, K 的土地测量员身份的模糊性凸显了它的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必

须从彼此相对的两个不同向度去理解这一点。其一,如果K真的是一名受聘于城堡的土地测量员,那么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事先取得了官方认证,但如此一来他也就必须服从于城堡。既然城堡并没有给K分配实际的工作,作为城堡下属的他就应该耐心等待,此时城堡剥夺了K想要从事工作的自由意志,这也是K觉察到自己的土地测量员身份有名无实的原因。此类只得到官方认可却得不到自由的状态,联结的是布拉格犹太定居者只得到统治者承认却没有自身民族身份的处境。其二,如果K只是一个说谎的流浪汉,那么他的自由的确得到了保证,但他却一直也无法取得官方的认可。此类留下了自由却没能被认可的状态,联结的是布拉格犹太定居者保持住了自身的民族身份却失去了统治者承认的处境。巧妙的是,通过K的身份的模糊性,上述两个向度被绞合到了一起。真实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向度,即只取得官方认可而无法保持自由;说谎的流浪汉又为我们展现出了另一个向度,即保持住了自由却得不到官方认可。如果K的身份是确定的,那么这两个向度只能任取其一,此时我们只能从小说中看出自由的难以获得抑或是官方认可的难以获得。然而,一旦K既可能是一名土地测量员又可能不是,那么两个向度便纠缠到了一起,拥有了认可就要失去自由,拥有了自由就要失去认可。此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自由或官方认可到底哪一个难以获得,而是自由和官方认可二者的不可兼得。因而,通过K的身份的模糊性,《城堡》表现出了统治者承认和民族意识二者不可兼得这一布拉格犹太定居者的身份认同困境。

总而言之,K究竟是不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本身就是一个无法明确解答的问题。简单地认定“是”或“不是”都是武断的。进一步看,“K是一个土地测量员”(Kafka, 1983: 8)或者“K是一个流浪汉”(Kafka, 1983: 10)实际上均构成一种稳定的主系表结构,K借此结构获得了某一个稳定的身份——土地测量员或流浪汉。然而,通过模糊性,卡夫卡抽去了“K是……”这一稳定句法结构的表语,使得“K是谁?”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由此,K的身份便始终无法稳定下来,深刻地展现出了布拉格犹太定居者身份认同的尴尬。

参考文献:

- Brod, Max. 1966. *Über Franz Kafka*[M]. Frankfurt am Main: Fisher Bücherei.
- Demetz, Peter. 1997. *Prague in Black and Gold: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a European City*[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7.
- Kafka, Franz. 1983. *Das Schloß*[M]. Frankfurt am Main: Fisher Taschenbuch Verlag.
- Kann, Robert. 1948. German-speaking Jewry during Austria-Hungary's Constitutional Era (1867-1918)[J]. *Jewish Social Studies*(3): 239-256.
- Lieven, Dominic. 1999. Dilemmas of Empire 1850-1918, Territory, Identit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2): 163-200.

- Rupnik, Jacques. 1990. Central Europe or Mitteleuropa? [J]. *Daedalus* (1): 249-278.
- Sokel, Walter. 1959. *The Writer in Extremis: Expressio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Literatur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ector, Scott. 2000. *Prague Territories: National Conflict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in Franz Kafka's Fin de Siècl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einberg, Erwin. 1965. K of the Castle: Ostensible Land-Surveyor[J]. *College English* (1): 185-189.
- 勃罗德. 1997. 卡夫卡传[M]. 叶廷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胡志明. 2007. 卡夫卡现象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贾德森. 2017. 哈布斯堡王朝[M]. 杨乐言,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卡夫卡. 2015. 卡夫卡全集:第3卷 城堡[M]. 赵蓉恒,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自该书的内容仅标注页码)
- 马奥尼. 2013. 捷克和斯洛伐克史[M]. 陈静,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聂珍钊. 2015. 外国文学史[M]. 下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卫克安. 2017. 哈布斯堡王朝:翱翔欧洲700年的双头鹰[M]. 李丹莉,韩微,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 吴金涛. 2007. 卡夫卡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 谢春平,黄莉,王树文. 2002. 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罪罚与拯救主题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阎嘉. 1996. 卡夫卡:反抗人格[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 叶廷芳. 2009. 卡夫卡及其他:叶廷芳德语文学散论[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 叶廷芳. 1988. 论卡夫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曾艳兵. 2009. 卡夫卡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玉娟. 2009. 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图式[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郑际根. 2007. 独一无二的卡夫卡[M].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 郑克鲁. 2007. 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下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The Puzzle of Land Surveyor in *The Castl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Dilemma of the Jewish Settlers in Prague

REN Long

Abstract: *The Castl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Kafka research fiel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fundamental and critical issues in the novel that have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Whether K is a land surveyor is one of those questions. On this issue, the opinions of Kafka researchers vary, and they all hold the corresponding evidences. In fact, K's identification is inherently ambiguous. Asserting he is a land surveyor or not is arbitrary. Behind K's ambiguous identification lies the identification dilemma of the Jewish settlers in Prague.

Key words: *The Castle*; land surveyor; ambiguousness; identification

责任编辑:冯革